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鲁迅论孔孟之道是科学的死敌

刘再复 金秋鹏 黄顺通

自然科学是人类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必然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密切相联系，受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影响和制约。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中，存在着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全部自然科学史，都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也反映到自然科学领域中。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儒家集团，敌视和反对自然科学，竭力宣扬和维护守旧倒退的孔孟之道，阻挠、破坏和扼杀科学的发展。孔老二已经死了二千多年了，但是这种贵族奴隶主意识形态还一直影响到现在。资产阶级和他的代表人物，还以孔孟之道为武器，在各个方面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因此，我们应当在自然科学各部门，落实“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阵地。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在这个领域里反映出来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和学求，特别是批判孔孟之道。在这个方面，鲁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一直毫不妥协地对孔孟之道进行最全面、最彻底的批判。在自然科学范围内，鲁迅深刻地揭露了儒家反科学的本性，指出孔学乃是科学的死敌。鲁迅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人民，在他的早年，他就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明了自己满腔热血献给祖国进步事业的志向，并且选择了医学作为他救国的工具。但是，革命的发展又打破他这种医学救国的幻想，使他的志向从自然科学移向文学艺术和别的思想战线。鲁迅的基本战线转移了，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然科学这一阵地，相反，他在向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旧势力、旧思想的勇猛战斗中，为科学发展开拓道路。他在满怀爱国热情地讴歌我国劳动人民的科学创造的同时，痛切地感到，孔孟之道不仅是反革命之道，而且也是反科学之道，只有勇猛地冲决儒家的思想障碍，打破这一束缚革命精神的桎梏，才能使科学得到发展。因此，鲁迅一直把揭露孔孟之道反科学的罪恶，作为自己反孔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小撮儒家是科学上的“昏虫”

敢于反潮流的鲁迅，十分蔑视儒家这一权威，他透过孔丘和儒家那种所谓“圣集大成”的庞大假象，看到他们渺小的本质。1935年，他写了一篇“名人和名言”的战斗文章，批评了那种认为“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迷信思想，指出：“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名人不一定很高明。鲁迅指出，在中国名与实不符，突出地表现在儒家身上。鲁迅说：“……名人的

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且介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这段话把儒家名高实秕糠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专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的儒家名士,只懂得死背四书五经,高谈八股教条,对国家兴亡、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根本一窍不通,他们靠八股文登第,借虚假的高名骗人,竟然也干起治河、开矿、造船这些科学技术的“事业”来。他们搞什么“经学治河”,而结果带给人民的却仅是家破人亡的灾祸。

儒家集团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名实不符的骗子集团,儒家的祖宗孔丘名为至圣,实际上是一个“贪于饮食,惰于作务”的寄生虫;他活着的时候,曾“为野人所嘲弄”,正是因为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毫无知识。此人就是“靠天吃饭”,(华盖集续编:谈皇帝)拿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天命”唬人,并没有什么学问。所以,鲁迅说他们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当他们也摆出有学问的架式时,恰恰暴露出极其荒唐的可憎面目。鲁迅特别描绘了明清儒家的所谓学术研究,说明清的“古之儒者”,他们倒做了一点考古科学了。但他们考究的是女人“缠足”迟早的“下等事”,并为这个问题“分为两大派”,“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缠足”之争,也可算为儒家的“科学”了。

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极端贫乏,有时闹到非常可笑的地步。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普通的科学论断,在一千八百多年前,我国汉代的伟大科学家张衡早已提出了。可是,仅仅会唱“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的“老调子”的儒家,到了近代还不懂。鲁迅说:“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更可笑的是,算术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经过辛勤的劳动,早已创造了与生产斗争紧密结合的数学体系,在分数论、勾股弦定理、大衍求一术、方程论、几何学、圆周率、计算技术等数学的各方面,都在世界科学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篇章。但是“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却“连算术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且介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在批判以孔学为立身之本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学衡”派时,曾揭露了这一点。他在“估《学衡》”一文中,就“估一估”这伙现代的孔孟之徒的斤两。一共估了六条,其中有一条是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浙江采集植物游记”。鲁迅说,“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务与游不并举”,采集植物这一普通的科学事务,在这伙现代儒家眼里,竟成了一种“漫游”。所以满口“学问”的古今儒家,正是这样一种满腹秕糠的骗子。因此,鲁迅称这伙孔孟之徒为“大小昏虫”,他们的所谓“圣人之言”,其实也不过是“昏虫”的“放屁”而已。

儒家对科学的极端敌视和仇恨

鲁迅曾指出,孔学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正如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对科学的极端敌视一样,儒家对科学是充满着疯狂仇恨的。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在五四文化革命浪涛中,真正高举科学大旗的,不是胡适、丁

文江之流,而是鲁迅。用医学救国的幻想破灭之后的鲁迅,知道一个真理,这就是要发展自然科学,首先应当展开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只有革命的成功,才能赢得科学发展的锦绣前程。因此,在五卅运动中,鲁迅一方面把科学作为批判孔家店的一种重要武器,一方面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勇猛冲锋,为科学的发展大声呐喊,鲁迅疾呼:决不能“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热风:随感录四十八)科学与孔学决无调和的余地。他在批判“儒道诸公”时,又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热风:随感录三十三)把奠基于唯物论的教人“道理明白”的科学和奠基于唯心论的“讲鬼话”的孔学,明确地区分为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潮、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这是具有很强的战斗性的革命思想。

孔学与科学的尖锐对立是有很长的历史的,而这一斗争又是与我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相联系的。孔学,他的哲学基础,是孔丘的天命论,这就是十足的唯心主义鬼话。这种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鬼话,后来又经过许多儒者的修补和发展。到了汉代,董仲舒继承了孔丘的天命观,提出“天人感应”的谬说,建立了完整的封建神学世界观,使孔学与神学进一步结合。到了二十世纪,鲁迅指出,董仲舒这个“先儒”的一套鬼话仍为现代的“今儒”所继续,他说,“迎神求雨”,“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赏为今儒所订正……。”(花边文学:迎神与咬人)对于“今儒”继续“先儒”天命之类的鬼话,鲁迅十分气愤,鲁迅早期就具有了“天人决战,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因此,他对这种求神祈雨的鬼把戏是决不能容忍的。他指出,这套把戏已经严重地破坏生产、危及民族的生存了,有些地方原是繁盛之区,但在儒家天命论的影响下,“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不大值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靠天吃饭)

“为活人计”,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应当抛弃儒家的鬼话了,而用什么代替这鬼话,医治儒家留下的“祖传老病”呢?鲁迅认为,只有一味药,“就是科学”。“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热风:随感录三十三)但是,抱着孔圣人不放的“今儒”,是决不让科学取代它的地位,去医治中国人身上的“无名肿毒”的。这些把“疽痈”当成“宝贝”的“昏乱分子”,为的是抱住老朽的国粹、骗人的儒学,并借以托庇寄生,“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这样他们对教人民明白新道理,教国家“适应新环境”的科学,当然是“最恨”的了。

正因为这样,敌视“科学”的一群尊孔派,特别憎恨把科学和社会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考察的“议论”。在自然科学本身的一些真理无可辩驳地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尤其害怕这种“议论”。因为这种“议论”,不仅为科学的发展制造舆论,而且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戳穿了“今儒”们把科学和这种议论视为毒蛇猛兽的恐惧与仇恨,他说:尊孔的“老先生”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了,专讲这也还可以,但决不准借此发表抨击“祖传老病”的战斗议论,在他们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复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鲁迅全集》,卷九,书信)他们和科学以及科学的战斗的议论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了。

由于对科学的敌视与仇恨,儒家们使用了各种卑鄙的手段,竭力排斥、破坏科学。在历史

上,他们公然对科学上有所创造者实行镇压,他们叫嚷:“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到近代,孔孟之徒则“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鲁迅全集》,卷十),并且给科学加上种种罪名,胡扯什么科学进步则道德必然退步,“万恶都由科学”,甚至“向科学宣告死刑”(热风:随感录三十三)鲁迅指出:“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热风:随感集三十三)他们仇恨一切新生事物,故意和一切先进的科学思想甚至一般的科学方法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谈起)与科学势不两立。

孔孟之徒除了对科学进行明目张胆的打击之外,还有一个破坏科学的恶劣手段就是捣乱。鲁迅说讲鬼话的人排除科学的方法,“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屏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热风:随感集三十三)他们讲卫生学,说什么“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热风:随感集三十三)他们讲“摄影学,说什么洋人专挖眼睛,挖去了可以做照相机。”(坟:论照相之类)他们讲语义学,说什么“‘蚩’、‘赤’同音”,所以“赤化分子的始祖是蚩尤”。(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他们讲医学,则搬出他们的祖宗孟轲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胡说什么“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坟:论照相之类)竭力以假乱真,歪曲、丑化科学,妄图把它纳入孔孟之道,使科学变成孔学的奴仆。说穿了,是取消了科学。

这一套捣乱的方法,实际上是“儒术”在破坏科学上的运用。毛主席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科学的本性是老实的。科学态度的反面,是虚伪的态度,而这正是儒家的特征。儒家,作为巧伪人,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极端虚伪的“瞒和骗”,他们的手法是极端卑劣的“儒术”,这套被鲁迅称之为“儒术”的东西,就是阴一套、阳一套,言行不一、口蜜腹剑的大骗术。鲁迅对耍这套骗术的儒家异常憎恶,特地在“非攻”的历史小说中让墨子概括一下儒家的咀脸:“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故事新编:非攻)孔孟之徒为了反对科学,竟不惜使用猪狗式的卑劣手段,确实是既可怜又可耻。

孔孟之道是科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孔孟之道的思想实质是守旧倒退,反对革新的。它代表着旧中国反动的思想文化传统,这种充满着糟粕的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鲁迅很早就看穿了孔孟之道的思想实质,指出孔孟之道是“碍脚的旧轨道”,(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它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旧轨道”,也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旧轨道”。社会要前进,科学要前进,就必须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

鲁迅在1926年曾向从事科学的人提倡一种“好事”精神,他曾经说过,“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看各科学家的种种新发明,他们的成绩,何一不是从好事得来的。”这种“好事”精神,就是和因循守旧相反的大胆革新精神,就是敢想、敢说、敢做、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史证明,自古以来,开拓科学技术新道路的,都不是那些墨守陈规的名家、大人物,而往往是一些学问比较少的但是敢于藐视古董、藐视权威、富有革命精神的“好事”年青人、小人物。我国卓越的科学家祖冲之,就是一个不畏权威、敢于创新的“好事”者。在他的青年时代,就不“虚推古人”,敢于对我国历代天文学

家、数学家刘歆、张衡、郑玄、阚泽、王蕃、刘徽、何承天等人的学说提出挑战，驳正了他们的一些错误，并从中引出许多重大的成就，如准确到七位数字的圆周率，就比欧洲的同样数据早了一千多年，在科学发展史上作出了伟大贡献。在我国及世界科学史上，象祖冲之这样“好事”的年青人是很多的。鲁迅提倡这种“好事”精神，对于解放思想、发展科学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儒家是决不允许有什么“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革命精神的，相反，他们要的是和这“四敢”针锋相对的非礼“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极端保守反动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一整套的东西，使人们的思想凝固僵化，成为扼杀科学创见的巨大绳索。在历史上，凡是违反这一套东西的皆视为异端。历史上法家主张厚今薄古、主张革新的思想皆视为“异端的声音”，历史上的一些科学发明也视为不合经义的异端之“作”。正如鲁迅所说的：“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坟：我之节烈观）孔孟之流从“克己复礼”的复辟总纲领出发，对法家那种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路线最为害怕，正如鲁迅所说的，儒家对“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坟：我之节烈观）

孔丘有一句座右铭，叫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公然宣布“作”的罪行，说“作为淫巧，必行其罪。”在这种“述而不作”的反动路线下，连一个酒杯的形状也不许有丝毫的变革，科学发明竟成了犯罪行为。有志于革新的人，如果发明创造一件东西，“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觔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热风：随感录四十一）这种守旧有功、革新有罪、功罪颠倒的儒家王法，成了科学发展的巨大阻力。所以鲁迅气愤地说，在中国，革新创造“太难”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坟：娜拉走后怎样）孔孟之徒为“保持现状”，甚至“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须得“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才在“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鲁迅全集》，卷十）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小撮死守孔孟之道的封建复古主义者，竟荒唐地撰文主张禁止用钢笔写字，胡说如不一律“改用毛笔”，“国粹渐就沦丧”。连笔都不许革新，对此，鲁迅特写了“论毛笔之类”的杂文给予痛击。总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儒家学派，“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鲁迅指出，孔孟之流反对发明创造“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他们反对医学和解剖学，其口实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反对科学上的新生事物，口实是“古已有之”，“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坟：科学史教篇）“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灵乩”，是“合于‘科学’”的。（花边文学：偶感）他们甚至以自己的谬说冒充科学，说什么“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批判了这种种荒谬论点，并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一文中，尖锐地讽刺儒家打着孝道的破烂招牌，反对大禹用科学方法治水的丑恶咀脸。大禹在治水时，改变了他父亲“湮”的方法，“湮”即填塞。而改用疏通，即“导”这样一种方法。这是在认识洪水规律基础上征服洪水的一种科学方法，但它却遭到一些腐儒的拚命反对，其口实就是违反孝道。在“理水”一书中鲁迅这样描写：

.....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咀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溼’,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静得好象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咀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抗议道:“溼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这个“白须白发”的儒,为了维护陈腐的孝道,反对治水方法的革新,竟不顾洪水朝天,人民死活,也不顾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了.鲁迅对儒家这种守旧倒退,反对科学变革的倒行逆施,感到无比愤怒.他指出,这正是社会退化的根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指出儒家这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鲁迅全集》,卷十)孔孟之徒确实是社会“进步的大害”,科学“进步的大害”.

面对这“进步的大害”怎么办?鲁迅的回答是:“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是“蔑弃古训”,“抛弃老调子”.鲁迅说得好:“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这就给一伙“祖述尧舜”、“述而不作”的孔孟之徒当头一棒.

孔孟之徒尊孔复古崇洋媚外的双重性格

鲁迅在对孔孟之徒深刻的批判中,告诉我们,尊孔的保古家,是很容易变成媚外的洋奴派的.他们可以同时对“孔圣人”和“洋大人”顶礼膜拜.他们阻挠中国社会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可以用复古主义,也可兼之用洋奴哲学.孔孟之徒标榜只有象他们那样“保存中国固有文化”才不是奴隶,其实,鲁迅说,他们“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并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进行文化侵略.在这过程中,也传入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他们这样做,原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物质文明,让中国拜倒在他们的脚下.然而,一些有志气的中国人接受了先进的科学,反而把它变成反帝反封建的一种武器,这便使帝国主义恐慌万状.于是,他们使用自己的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利用愚弄中国人民的孔孟之道,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精神支柱,堵住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向前发展的道路,也堵住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所以鲁迅说,外国人来灭中国,对“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而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迎合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们是国际资本的附庸.他们为了维护在中国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镇压人民革命,就必然要祭起孔孟的反革命之道,坚持“思想要旧”,大肆尊孔复古.同时,又必然要找帝国主义主子做靠山,求得“本领要新”,拿帝国主义的洋刀子来配合孔孟之道的软刀子,对付中国人民.因

此,也就大肆鼓吹崇洋卖国哲学。这样,中国近代的孔孟之徒,便一身二任,具备了既尊孔复古又崇洋卖国的双重性格。由于他们大肆鼓吹洋奴哲学,我国的科学技术便更加处于窒息的境地。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儒家大卫道者曾国藩、李鸿章,一方面对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如丧考妣,发誓要重整“扫地荡尽”的“千年礼义人伦”,另一方面,为了联合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却对帝国主义一副媚态,胡说什么“中不如西”,“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甚至对帝国主义的掠夺也加以赞美。鲁迅很早就对这伙官僚地主兼买办的媚外主义进行抵制,他指出:“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罢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又何耶?”(按:文化偏至论)惯于赞美“至圣先师”的李鸿章之流,却歌颂起“白人肉攫之心”了。可见,这伙尊孔顽固派蜕变出来的洋务派,他们“办洋务”,根本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而是向洋人购买镇压革命的武器,向洋大人乞讨一些过时的设备、原料、技术。他们一心只等帝国主义的“恩赐”,哪有想到建立自己民族的科学技术呢?在辛亥革命后,有些混在革命派里的尊孔复古派,又抛出一套洋奴哲学,鲁迅说这些人“游行欧土,偏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指:束腰的女子)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纤腰者为野蛮矣”。(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他们眼里洋人的东西什么都好,肮脏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是“文明”之极。外国的东西,就得全盘接受,连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也不例外,否则,就是“野蛮”了。这些崇奉祖宗的儒家,连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崇奉外国也是够彻底的了。

鲁迅指出,对于外国的东西,“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坚持批判吸收的原则,对于中国和外国那种于中国人民有利的科学技术,我们就要象吃“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作为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养料”,为我所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都深深地打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决不能“全盘接受”。对于糟粕的东西,鲁迅比之为“鸦片”、“烟枪”、“烟灯”之类,就要坚决加以摒弃。

鲁迅认为,即使对外国一些有贡献的科学家、名人,也不要一味迷信,盲目崇拜,应当加以分析。鲁迅特举了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和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耳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鲁迅说,维尔晓“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然而他的哲学观是唯心论的,他把他的学问“一口归功于上帝”。对于法布耳,鲁迅一方面肯定他的著作“昆虫记”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另一方面也指出,“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鲁迅是不迷信外国权威的。对于外国的科学文化遗产,一般地说,在前期,鲁迅强调学习的较多,到了后期,由于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得更全面、更科学了。

鲁迅在后期所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杂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人民只有靠自己,相信自己,才是“一条新生路”。鲁迅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尊孔、反共、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谬论,指出这些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从来就是敌视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他们走的是一条死路。先是自夸中国的古文明,接着相信“国联”,最后“求神拜佛”。即先是尊孔,后是崇洋,最后是麻醉自己、欺骗人民。中国要前进是靠自己,即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呢?还是靠尊孔崇洋呢?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

鲁迅作为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表现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

可宝贵的性格。在他生活的前期,尽管看到中国近代科学比较落后,必须接受外来的新事物,但他对祖国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他一再提倡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提出的“不耻最后”的硬干精神,“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中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华盖集:补白)鲁迅对这种不怕暂时落后、不怕失败、坚持奋斗、坚持前进的中国人给予高度的评价:“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依靠这些“脊梁”,自力更生,中国必然会踏出“一条新生路”。鲁迅这种革命精神,给孔孟之徒那种守旧倒退的论点,崇洋媚外的论点以致命性的打击,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是,鲁迅提倡的这种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发图强的精神,仍然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力量。

“上智下愚”是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大颠倒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真理。实践出真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经验的劳动群众。劳动群众不仅以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为科学技术提供赖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自身参加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他们是创造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主力军,他们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是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孔丘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颠倒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颠倒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历代的反动阶级,通过这种历史的大颠倒,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为他们压迫、剥削、统治劳动人民制造根据;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为他们建立科学上的垄断地位服务。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在我国历史上起了十分反动的作用。仅就科学的发展来说,它不知埋葬了劳动人民多少科学的发明和创造。

鲁迅对这种和历史唯物论根本对立的“上智下愚”,从各个侧面给予驳斥。用科学发展的一些历史事实加以批判,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鲁迅指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写在“坟”后面)并说:“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人民群众是人类文化和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科学技术的真正创造者。鲁迅针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反动阶级的颠倒历史和阶级偏见,这样说:“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知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花边文学:知了世界)而事实是,“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步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南腔北调集:经验)

鲁迅曾列举过一些历史事实论证了劳动群众是创造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主力军。

关于文字的发明,鲁迅认为,文字并不是“生着四只眼睛”的“古圣王”仓颉发明的,也不是某些专家学者这些“新仓颉”创造的。鲁迅指出文字的造成乃是人民群众千百万年在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业绩,他说:“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归根到底,“文字在人民间萌芽”。(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关于医药的发现,鲁迅认为,药物不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在

长期实践中发现的,开始也是因为发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就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鲁迅还以药物学的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例,说明医学上的大创造也是由于“历久的经验,”经验“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南腔北调集:经验)

由此可见,正是劳动人民的勇敢智慧,正是他们不断的生产实践,才创造和发展了科学技术。孔孟及其信徒林彪一类鼓吹“上智下愚”,正是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最大颠倒。

* * *

关于孔学与科学的对立,我们从鲁迅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这些论述用充分的事实说明:孔学乃是科学的大敌。孔学,作为历代反动阶级复辟倒退,反对革命的思想武器,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尽了刽子手的职能。儒家一方面作为旧事物的保皇党,竭力维护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方面作为新事物的屠杀者,又竭力摧残科学上的新发明、新创造。在鲁迅生活的年代里,大肆尊孔的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卖国集团,一面把孔丘抬高到吓人的高度,一面把中国人民,也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拖向了绝境。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祖国美好的将来,鲁迅整整奋斗了一生。今天,鲁迅的战斗理想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在中国的统治,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空前解放,我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的光辉论断:**“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给“孔夫子的‘经书’”以摧毁性的打击,使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到新的高度。这将使我国生气勃勃的科学技术事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以更雄伟的步伐,向前奋进!